

## 中国同缅甸历史上 的文化交流(中)

陈 炎

### 六、元缅战争和两国的文化交流

中缅两国的关系到13世纪后半期，有了重大的转变。濒于危亡的缅甸蒲甘王朝同中国新兴起的元朝之间的关系，是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发展的。1253年元世祖灭大理国后，元朝同缅甸曾发生过三次较大的战争：第一次在1277年是缅军入侵我国边境干崖等地，驻南甸的元军赶往救援，战争沿太平江一带展开。史称牙嵩羌（缅名“Nga-saung-gyan”即南宋甸）之战，缅军大败，元军追至江头城。<sup>②</sup>后因天热，撤兵回国；第二次在1283~1287年元军进攻缅甸，最后攻入缅甸都城蒲甘；第三次在1300年，缅王桥苴被废，掸族篡夺王位，缅王世子遣使向中国求援，元军应邀入缅包围掸族封建主占领的木连城。<sup>③</sup>由于军事上的需要，云南至缅甸的水陆交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进军路线：由腾越入缅→江头城（今杰沙，说八莫）、太公城（今塔冈）、马来城（今曼德勒）、安正国城（今新古）、蒲甘缅王城（今蒲甘），是为元时由云南入缅的水陆交通要道，史称缅中五城。由于战争，从云南入缅的军民大量增加。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还在缅甸设征缅行省。1303年撤销后，于1338年又设邦牙宣慰司都元帅府，“立其酋长为帅”，戍军驻缅二十多年。据姚燧的《千户所厅壁记》说：“我元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故万夫、千夫、百

夫之长，无公廨城邑者。”可见统治阶级虽然对缅甸用兵，而从中国各地抽调来的各兄弟民族的士兵，却有机会长期在缅甸民间居住，同缅甸人民一起生活。他们的文化就在缅甸开始传播。同时，中缅两国官方的联系也比以前增多了。据初步统计终元之世，缅甸至少十三次遣使至元朝，而元朝派使节至缅甸约有六次。两国在政治上联系的加强，又促进了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随着中国军事、行政、职官制度在缅甸的建立，中国的历法、天文如：星相、正朔、农业节气、干支纪年、五行、七曜日、十二生肖（亦称十二相属）……等等曾在缅甸流行，对缅甸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至今缅甸的节气，仍类似中国的农历，也有闰年，缅名“瓦塔聂”（Wà-tha-Nhit）。同样，缅甸新年的泼水节也在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一带兄弟民族地区盛行。泼水节同两国的历法、农业节令相联系，反映了两国劳动人民在春耕农忙前的狂欢心情，互相泼水又含有洒水洗尘，消灾纳福和助天降雨、祈求丰收之意。同我国春节一样，象征大地春回、新春伊始，劳动人民都愿以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现在缅甸人民和缅甸语文中称中国人为“德卢”或“德由”。据缅甸学者的考证，这个名称也是在元缅战争时才产生的。1285年，当元朝大军压境时，缅王派遣高僧信第达巴茂克出使中国至大都（今北京）议和。由于他是德高望重的佛教领袖，又有外交的才能和感人的佛教教义，终于说服了虔诚的佛教信徒——元朝统治者忽必烈，取得了终止进军蒲甘的外交上的胜利。回国后，缅王因其出使有功，钦赐水旱地各四百亩和耕畜、农奴等。他把这些赐予，全部作为功德布施给敏格拉悉提佛塔（亦称吉祥塔），并将出使中国的详细情况，镌刻在《信第达巴茂克碑铭》上<sup>⑤</sup>。碑文中称中国为“德卢”（缅文“Ta-ruk”现在书写体亦称德由“Ta-yuk”，缅语中R与y可互相转化），是蒙古语“达鲁噶”

亦名“达鲁花赤”（即治民官吏）的对音<sup>④</sup>。从此成为专称中国和中国人的专用名词。可见元缅战争时蒙古语对缅甸也发生过影响，又如蒙古军队中的“司鹰官”蒙古语称“昔宝赤”。至今尚能在蒲甘江喜陀寺内的壁画中见到一位蒙古军官穿靴戴盔，手举一只小鹰，他就是“昔宝赤”的壁画。他和另一幅元军士兵张弓射矢的壁画，今天已经成为缅甸蒲甘文化中的珍贵文物<sup>⑤</sup>。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信第达巴茂克碑铭》的记载中，还提到1286年忽必烈派他的王子雪雪的斤率大军进入缅甸时，尚有一个庞大的僧侣使团，由两位法师率领七十个寺庙的僧侣随行，入缅后驻于太公城。由此可见，忽必烈深知缅甸是信奉佛教的国家，光靠军事力量是不能征服缅甸人心的。所以他还想用宗教的力量去征服缅甸的佛教信徒。而缅王选派高僧信第达巴茂克为出使中国和谈的首席代表，也是想通过这位高僧用佛教的教义，去说服崇信佛教的忽必烈。结果使双方都取得了胜利。这是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发展到应用于外交上的罕见范例。元朝的统治者动员了七十座寺庙的僧侣，配合军事上的需要，随军至缅甸布道弘法，使西藏的喇嘛教得以在缅甸广为流传，至今缅文中的“喇嘛”这个词汇，就是那时传入的。

中缅两国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是违背两国人民要求和平友好的愿望的。1300年元朝对缅甸用兵时，统率元军的云南参知政事高庆等人不但未执行对缅甸作战的命令，反而率军协助当地人民为解除旱灾抢修叫栖（今皎克西）一带水利灌溉工程，并挖掘了一条顶兑(Thintwe)运河<sup>⑥</sup>。这些水利工程成为缅甸人民的经济命脉，至今对发展农业生产仍在起重要的作用。这是中缅两国人民即使在战争期间，尚能共同协作，互相帮助的典范。元军在工程结束后，借口“炎暑瘴疫，撤军回国。”元军撤离时，掸族首领僧哥速曾在庆功会上，即席赋诗。诗中描述了元军精于弓箭的情景。这首诗现被缅甸文学界列为文学作品选中的名著之一<sup>⑦</sup>。

元朝同缅甸的海上贸易也有新的发展。据元代航海家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其中有专条叙述：针路、淡邈、都八马、乌爹等地。据学者们考证，一般都认为它们是下缅甸的沿海城市。针路即今丹荖；淡邈即今土瓦；都八马为马都八（Martaban）颠倒之误，即今莫塔马（缅甸Muttama）；乌爹即今勃固（Pegu）都是下缅甸孟族地区的海港城市。汪大渊除记载中国海船到这些城市进行贸易交换，中国以丝绸、瓷器、乐器、金银、铜铁去换取缅甸的特产：象牙、胡椒、稻米……等情况外，还特别提到当地：

“每个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易贝子（海贝）计11.520有余，折钱使用。以250贝子余一尖箩熟米，折官斗有一斗六升。每钱收贝子可得46箩米，通计73斗6升，可供二人一岁之食有余。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也。夫以外夷而得知务农重谷，使国无游民，故家人足，岁无饥寒之忧。设知兴行礼让，教以诗书礼乐，则与中国之风无间然矣（着重号为引者所加）”<sup>⑧</sup>。上述这段记载对研究14世纪中缅两国民间经济文化交流有重大参考价值，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汪大渊两次远航都是从福建泉州出发的。可见福建泉州一带的海商，早已乘海船到缅甸沿海各城市经商，中国精美的丝绸、瓷器、金银、乐器（鼓瑟）等，虽然作为商品输入缅甸，但对缅甸的文化是有影响的。象丝绸、瓷器不仅是人民物质生活上的必需品，而且也是供精神生活享受的观赏品，因为它们都是非常精湛的工艺美术珍品，同乐器一样，本身就属文化艺术范畴。缅甸马都八产的象牙“重者百余斤，轻者七八十斤”，也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珍品“牙雕”的珍贵原料。所以互通有无的贸易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二）元代货币中统钞能在缅甸流通，与当地的通货贝子和银钱有一定的比价，说明元代的“中统钞”币制已传入缅甸，并在当地产生影响。同样，在缅甸流通的贝子，据《马可波罗游

记》记载也在我国云南一带盛行<sup>⑤</sup>。计算海贝之数：“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可见这种四四五的进位法，有一路可能是从下缅甸沿海城市传到我国云南一带的。海贝传入云南已有悠久的历史，《后汉书·西南夷》中就记载哀牢出珂虫（即海贝）。从云南出土的墓葬中海贝有穿孔，也是以80枚为一“索”，反映了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

（三）文中详细记载了中缅两国度量衡的折算比例。如当地一箩米折元代官斗一斗六升。每钱收赋子可得米46箩，合计73斗6升。可供二人一岁之食有余。这对研究两国古代社会经济和对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的数据。

（四）由于至该地经商生活容易，“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也。”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以前治缅甸华侨史者，常以为缅甸之有华侨，始自明代。以上记载否定了这一说法，证明至迟从元代开始，福建泉州等地的海商就到下缅甸沿海经商，而且“十去九不还”，就留居该地，与当地人民婚娶繁衍，是为缅甸华侨的由来。这些华人与当地人民生活在一起，是传播汉文化的媒介。他们对缅甸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缅文中的许多汉语借词如：筷子、豆腐、油炸桧（油条）、荔枝、帆船（称唐舡）、舢舨……等大多是用福建音拼写的。华侨精通缅甸文，讲得一口流利缅甸语的，也大有人在。例如1504年缅王遣使来中国通好，担任通事（高级翻译）的李瓚，就是寓居缅甸的华侨<sup>⑥</sup>。他们为中缅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七、明朝同缅甸的文化交流

14世纪后半期，缅甸的国内形势比较复杂。蒲甘王朝灭亡后，掸族于1364年在上缅甸阿瓦，建立了阿瓦王朝（1364~1555）。从1368年开始，与下缅甸孟族建立的白古王朝进行长达40年的战

争，双方力量都遭到削弱。而阿瓦以北的各土司地，群雄割据，威胁着阿瓦的安全。就在这时，中国的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新兴起的明朝取代了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在缅甸境内，相互争夺权力的几股势力，特别是中缅边境一带各土司都想同明朝建立关系，以争取到对他们的支持。而明朝的统治者也把他們视为是自己的藩属，册封为宣抚司或宣慰司，即所谓三宣六慰<sup>④</sup>。这些土司有些地处中国和缅甸之间，他们同两国都有密切的关系。1394年明朝在阿瓦设缅中宣慰使司后，与阿瓦王朝关系密切，往来频繁，又因阿瓦常与各土司纷争，明朝政府为双方排难解纷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395~1396年，阿瓦两次遣使入明，诉说麓川侵其地，明廷派钱古训、李思聪前去调解，使双方“罢兵和好”消除了纷争。回国后，钱古训著有《百夷传》记述山川人物风俗道路之详，为明代使节所写最早的第一手资料。1406年孟养同戛里发生了矛盾，阿瓦乘机侵孟养地。明廷又派张洪至阿瓦劝解，归还所占孟养地。张洪回国后写了《南夷书》和《使緬录》。这是以他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以上著作把当时的缅甸情况如实地介绍到中国，史料价值很高，对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有积极意义的，也可以说是今天研究中緬关系史的必读参考书。在研究中緬文化交流史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

由于同阿瓦和各土司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明朝政府为了便于往来在京设立缅甸邸，又向各宣慰司派出经历、都事各一员。因“土官不识中国文字，遇有奏报，不谙礼体，命吏部各置首领官，择能书而练于字事者往任之”<sup>⑤</sup>。

永乐五年（1407）三月，明朝正式成立四夷馆，并在馆内设缅甸馆。大约在正统年间（1436~1449）明朝政府当留下随缅甸使节来中国的缅甸人当丙、云清等六人，在缅甸馆任教，这是我国聘请缅甸籍教师来中国教缅甸语文的开始，并授予“序班”的中国官衔。他们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缅甸语翻译人才，“后俱卒于

官”。他们为促进两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而献出了一生。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敬仰！至弘治十七年（1504）因译学失传，明朝政府令云南地方官，请缅甸派人来任教。同年，缅甸阿瓦政府应命派陶孟（缅语意为“头目”）思完、通事（翻译）李瓚入访中国，选送孟香、的洒、香牛三位教师来缅甸馆任教，均授予鸿胪寺序班（从九品）的官衔。后来，的洒（汉名靖之）和孟香（汉名德馨）均晋升为光禄寺署丞（从七品）的官职。缅甸馆除缅甸教师外。也有不少中国教师。其中资格最老的为安徽歙县人方英和腾冲人刘迪。他们都是1490年任教，为光禄寺署正教师和通政司知事教师。缅甸馆以1509年留任的中国教师为最多，共10人。从1490~1604年先后在缅甸馆任教的，总共有28人<sup>③</sup>。缅甸馆的教师有父死子继的惯例。如缅甸馆序班教师夏凤朝病故，即由其子夏继恩于万历十二年（1584），由神宗准其在四夷馆内缅甸馆作“养继习”<sup>④</sup>。在缅甸馆内称此为继业生。据记载有姓名的继业生先后有赵继隆等共10人。入馆学习的称译字生分班由教师带领学习。例如教师序班：吴嘉胤、许辑瑞两人带的领译字生共12名<sup>⑤</sup>。译字生的课程，起初主要是专攻翻译杂字，就是学习一般文字翻译的技能。但明朝政府设四夷馆是为了“习译夷字以通朝贡。”提督四夷馆少卿郭鋈于1542年提出：“专攻番译杂字，不及诰敕、来文，恐非急务，今后三者并行肄习。”从此，翻译杂字、译写来文，回答敕谕成了译字生的三门主要课程。供译字生研习的课本称《华夷译语》，今均流失在国外，现德国柏林有藏本，最为完整共24编，第二编为缅甸译语<sup>⑥</sup>。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本缅华对照的词典。日本东洋文库本《华夷译语》中有缅甸语杂字，附译史纪余和缅甸国书（表文）<sup>⑦</sup>。法国巴黎也有藏本，向达先生生前曾将其与王宗载的《四夷馆考》和江蘩的《四译馆考》从巴黎抄回，使散失在国外的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失而复得。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今将向先生从法国抄回的当时缅甸馆课

本集字诗中由缅文译成汉文的两首诗，摘录如下，作为对他的纪念。

### 缅甸馆集字诗

#### (一) 五言律诗：

青草王孙路，    风尘四面沙。  
长亭生早月，    晚店送晴霞。  
钟出僧房夜，    泉沉水阁花。  
韭菜能下酒，    不敢问鱼虾。

#### (二) 七言绝句：

江岸秋风好送行，    阳关阴雨几时晴。  
马蹄别入千山外，    沙路云开见日生。

正教序班加二级许辑瑞<sup>㉔</sup>

译字官生靖琦、张文灿翻译

四夷馆至清初改名为四译馆仍沿袭明制，隶翰林院，至乾隆十三年（1748）又改名为会同四译馆。鸦片战争后，因与西方英法等国往来增多，会同四译馆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862年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内有英、法、德、俄等语种，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四夷馆开始至同文馆长达450多年之久，其间培养出大批外语翻译人才，最初是以培养周边国家和民族的东方语文为主。它对促进中国同包括缅甸在内的邻邦各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缅边境的永昌（今云南保山）自古是我国通往缅甸、东南亚、南亚各国的门户。至明代中缅贸易交往比前代更加繁荣，我国西南盛产的丝绸就大量经此外销，而从外国输入的商品也都由此集散，转运到内地。故有“永昌出异物”之称。

据缅甸作家貌叫温说：“从15世纪开始，中国商人就循着从永昌至勃固的商道，把中国的丝绸和其他货物源源运抵勃固。”<sup>㉕</sup>缅甸古代诗人吴西为称赞永昌的丝绸而写的一首诗中，描述永昌

产的丝，经过染色加工，织成漂亮的“白底金线翠色边”的三色丝绸，质地精良，绚烂夺目，只有宫廷中的达官贵人们才能享受。它是如此迷人，以至人们为之倾倒<sup>⑩</sup>！哈威《缅甸史》还提到：“1541年缅王莽瑞体攻陷下缅甸沿海商业城市马都八（今莫塔马）时，就发现仓库中藏满丝绸等货物。当时世界各国商人云集……。”<sup>⑪</sup>可见该地丝绸贸易之盛。中国丝绸不但输往缅甸，而且还以缅甸为媒介，再从海路运销到世界各地。

西方学者对从我国云南到缅甸的这条西南“丝道”的描述，那就更多了。例如史谷特说：“从云南到八莫的这条国际通道上，有从中国来的庞大的驮运商队（即马帮）数千骡马、数百劳工和商人，从中国运来大量丝绸。在八莫有座供中国商人休息和文化活动的关帝庙，还有许多仓库，堆满运来的丝绸和待运回去的棉花。”<sup>⑫</sup>当时缅甸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棉花。大量的棉花由伊洛瓦底江北运，每船装载一百筐，经八莫运入云南。据英国人估计以1826年为例，从缅甸输入中国的棉花达1,400万磅，价值228,000英镑。<sup>⑬</sup>我国西南缺乏棉花，缅甸棉花的输入，有助于我国西南纺织业的发展和解决原料不足的困难。

明代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中缅贸易往来的记载。明人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说：“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交易或五日一市，十日一市，惟孟密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盖其地多宝藏，商贾辐辏，故物价常平。……普坎（蒲甘）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缅人称为汉地方。……器用陶、瓦、铜、铁、尤善采漆画金。其工匠皆广人，与中国侔。”他不但描述在上缅甸两国交往之深，贸易之盛，而且还对下缅甸沿海城市也有生动的记载。他说：“江海舳舻与中国同，海水日潮者二，乘船载米谷货物者，随之进退。白（原作“自”误）古（今勃固）江船不可数，高者四、五尺（丈？）长者二十丈，大桅巨纜，周围走廊，常载铜铁瓷器往来，亦

闽广海船也。”<sup>⑭</sup>

以上记载反映了明朝中国商人不论从云南的陆路，还是从闽广的海路到缅甸经商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两国政治、经济上的频繁交往，必然会带来文化交流上的繁荣。正如以上所说，明设三宣六慰后，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竟有数万人，再加三宣六慰带去的人亦有数万。这样多的中国人旅居在缅甸，缅甸不能不受汉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制作陶瓷、铜铁器等工匠都是中国人。他们把中国的手工艺的生产技术传到缅甸，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有：“与中国侔”、“饮食蒸煮炙博多与中国同”、“江海舳舻与中国同。”等语。记载中还说：“岁时，三宣六慰，皆奉天朝正朔，摆古（今勃固）无历，惟数甲子，今亦窃听于六慰，颇知旬朔矣。”<sup>⑮</sup>这句话也道出了中国文化对缅甸的影响。

另一方面，缅甸的文化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缅甸产的宝石举世闻名，自古是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唐代称为“瑟瑟”的绿宝石，它同中国丝绸在缅甸受到欢迎一样，曾在大理风行一时。所以《唐书》中有：“大理妇女多缀瑟瑟”，而《蛮书》中也提到“骠国妇女悉披罗缀”。这些记载，说明了中缅两国人民自古就互相喜爱对方的名产，从而丰富和美化了两国人民的生活。

到了明代，中缅两国的玉石珠宝贸易更盛极一时。缅北孟密有宝井，盛产各种名贵的宝石，蛮莫出各种玉石，孟拱盛产琥珀。其中以孟密宝井所产宝石最出名。开采的玉石从缅北运往腾冲琢磨加工，制成各种装饰品后，再运销全国或外销。我国商人在缅甸政府许可下，纳税开采，每年去缅北开采的工人多至千人，产量多时年达数千担，在缅甸经营玉石珠宝的商店多至百余家。缅京阿摩罗补罗的一个中国古庙中，还刻有五千个中国玉石商的名字<sup>⑯</sup>。

缅甸产的玉石是雕刻玉佛的珍贵材料，向为世界佛教界所推

崇。随着两国玉石贸易的发展，缅甸玉佛传入我国者不计其数。至今我国的佛教圣地，古刹名寺如五台山广济茅蓬的大玉佛、四川峨眉山金顶的大玉佛和上海玉佛寺的大玉佛都是峨眉山金顶的果迦法师自印度回国，途径缅甸朝拜大金塔时，缅甸佛教徒赠送给他的<sup>⑦</sup>。此外，浙江普陀山文物馆，杭州的灵隐寺、福州的涌泉寺，北京的北海团城等都有缅甸赠送的玉佛。这些千姿百态的玉佛、有卧佛、立佛和坐佛，均嵌有珍贵的宝石。其工艺之精美正如《滇海虞衡志》中所描述：“豪光焕发，惊动天人，洁白无瑕，巧夺神工。”<sup>⑧</sup>这是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明代许多文人学士目击我国劳动人民纷赴缅甸孟密宝井开采玉石、宝石矿的悲惨情景，写下了不少揭露当时宦官富贾巧取惊夺的文学作品和歌谣。如杨慎的《宝井谣》中就有：

君不见 永昌城南宝井路， 七里亭前碗水铺。  
情知死别少生还， 妻子爷娘泣相诉。  
……  
彩石光珠从古重， 窈窕繁华皆玩弄。  
岂知两片若云鬟， 戴却九夷重译贡。  
……<sup>⑨</sup>

明代另一位诗人张含为和杨慎的《宝井谣》，还写了一首《宝井歌》其中有：

成化年中宝石重， 私家暗买宦家用。  
祇在京师给帑银， 不作南夷作琛贡。  
林宝石家海内闻， 雄商大贾集如云。  
敕谕林家避科道， 恐有弹章皂囊到。

……

（见《腾越州志》卷三）

关于明代中缅珠宝贸易的诗词歌谣还有很多，如施武写的《宝井词》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缅甸还盛产翡翠，深为我国妇女所喜爱。许多女诗人也为此

作诗如李淑媛作的《秋思》：

翡翠帘疎不蔽风， 新凉初透碧纱栊。

涓涓玉露团团月， 说尽秋情草下虫。

（见陆次云：《译史纪余》卷二）

以上这些诗歌不仅反映了中缅两国珠宝贸易之盛，也反映了缅甸的珠宝输入中国后，对我国的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既丰富了我国文学作品的内容，也揭露当时社会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也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随着两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明初，在云南昆明设缅字馆。缅字馆是为培养翻译和招待外商而设立的译馆兼宾馆。外商来滇先到宾馆，通过翻译后，再进行交易。上述《宝井谣》中所说的：“岂知两片若云鬓，戴却九夷重译贡。”大意是，有谁知道妇女头上戴的珠宝，原来要经过几道翻译，才同外商作成交易。承担与外商翻译的，就是缅字馆的缅字生。因此，缅字馆也培养了许多为两国的外交和外贸服务的翻译人才。据记载：“缅字馆的讲习所设在云南布政司东南。凡缅人使至必用贝叶刻划来投，或用墨纸背之，层入板式用白粉和胶写之，形如蝌蚪，用通事翻译有不能通其义者，故设缅字馆<sup>③</sup>。”《滇系》中还有如下记载：“明初，设缅字馆于滇垣，令汉人习而译之。〔缅甸〕今虽十年一贡，然其输诚之奏、纳款之文，仍不时上达，亦当事者所宜讲求也。考缅字授自缅僧，有深浅优劣之别，精者知晦明风雨，日月剥蚀。”<sup>④</sup>

上述记载说明缅字馆聘请的缅甸高僧来我国传授缅文和他们的渊博知识，为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代的伟大航海家郑和自1405年起，曾七次远航。在《郑和航海图》上绘有下缅甸沿海城市的地名和方位。据中外学者考证，其中落坑（即仰光）、八都马（即莫塔马）、打歪（即土瓦）、答那思里（即丹那沙林），都是孟族的海港。但是随郑和

一起远航的马欢、费信和巩珍等人的著作中，却未见有这些缅甸海港城市的专条记载。这是因为缅甸偏离郑和的主要航线的缘故。但是民间的海上贸易还是很活跃的。除了朱孟震提到中国闽粤海船运载瓷器等商品至勃固销售外，我国已故陶瓷专家陈万里也在他的遗著中，提到中国青瓷从海路传入缅甸的情况。他说：

“自13世纪80年代至15世纪40年代，这150年期间，福建的泉州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我国青瓷从泉州港大量运往海外，运到缅甸的马达班湾(今莫塔马湾)的毛淡棉。该地是东西海上交通的转运中心。中国瓷器因为要在这里大量转运出口，也有在当地仿制的，所以称为麻尔拔里(Martabnri)，亦即马达班(Martaban)瓷器，行销缅甸全国，还转运到东南亚各国，享有极高声誉。”<sup>②</sup>据1915年缅甸考古调查局报告，在缅甸勃生河口曾发现15世纪(明代)的瓷器，被认为是珍贵的文物。哈威还提到当时下缅甸白古、马都八(今莫塔马)、颠逊(今丹那沙林)等海港城市有从中国运来的香木和瓷器，是最吸引人的商品。<sup>③</sup>

以上记载说明中国瓷器不仅传入缅甸，而且还在缅甸转口或在当地仿制出口。中国制瓷技术的传入缅甸，也不能不对缅甸的文化产生影响。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东语系

